

1995—2004《**隨筆**》作品精选

隨筆佳作

续编·下 册

花城出版社



1995—2004《随笔》作品精选

随笔佳作

续编·下册

杜渐坤 麦婵 编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笔佳作: 续编 (上, 下): 1995~2004《随笔》作品精选
杜渐坤, 麦婵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
ISBN 7-5360-4492-5

I. 随...

II. ①杜...②麦...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765 号

责任编辑: 麦 婵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

(广州永福路 44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48.25 1 插页

字 数 1,38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92-5/I·3576

定 价 上下册 9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下 册 目 录

2001 年

(总第 132—137 期)

- 1 黄修己 北大忆旧 (两篇)
7 顾 骧 谈茶说泉
10 何 方 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
27 张抗抗 感悟珍珠港
32 刘兴雨 陈独秀为何被罢免
35 王英琦 人死了
——20 世纪的突出问题
41 刘 征 虫豸小品
45 钱伯城 夜读随笔
56 李慎之 忆胡绳
——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62 雷 颐 麻雀与曹操
70 刘心武 顾影自赏
73 阎 纲 悼犯人李铜钟
77 张承志 四方的考古

- 83 劳 弓 马克思的一个论断
87 鄢烈山 反刍《入关告谕》
90 李 普 沫沙十年祭
101 张立勤 四月的思考
106 詹克明 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忧虑
113 袁 晞 猎人和猎物的历史
116 王充闾 情死
122 许 淇 石崇
126 流沙河 南窗横说
131 韩 羽 看《活捉三郎》
137 沙叶新 “检讨”文化
151 赵 园 内外
155 王彬彬 读《绝骂奇观》随想
161 王充闾 押会

2002 年

(总第 138—143 期)

- 169 资中筠 怎么就没有“正好”过?

175 吴小龙 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

189 贾植芳 《狱里狱外》新版题记

193 李育中 怪客奇诗之再忆
——补记聂绀弩二三事

196 张同吾 枣树意象和雨的精魂
——我眼中的诗家鲁迅

201 王学泰 读《百年一遇》

215 吴 思 灰牢考略

233 冯骥才 晋地三忧

237 王得后 猴子的教训

241 张 鸣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245 吴中杰 鲁迅对于学界的批评
——鲁迅书信选评

252 张守仁 邓拓与《燕山夜话》

262 吴小龙 悲情·人格·思考
——《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

275 雷 颐 “万岁”故事

280 季羨林 论“据理力争”

283 冯锡刚 “最喜诗人高唱至”
——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

303 霍 达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309 王开岭 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

313 李元洛 秋之颂
——绝句之旅

320 梅 洁 鹏远老师

325 左 泥 古今跪事略考

331 廖德全 远逝的珍珠城

342 王剑冰 雾中望庐

350 王本道 寒山寺悟禅

353 冯秋子 若没有阅读和写作，
我会是怎样一个让人痛心的人

2003 年

(总第 144—149 期)

356 陈 迟 斑斑血泪染“东林”
——兼祭邓拓逝世 36 周年

362 林斤澜 出生入死

369 冀 沅 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375 吴 江 得一佳句足矣

378 资中筠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也谈学术腐败

385 袁 鹰 江上春归
——写在陈独秀逝世 60 周年

394 吕锦华 泪别海参崴

397 朱增泉 访俄短语

408 田中禾 眷念皇帝

412 赵丽宏 小品和大师
——读苏东坡的小品

419 贾兴安 移民与村落
 425 冯骥才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外一篇）
 431 刘 粹 诗在你在——接父亲回家
 437 谢 泳 读《北京平民教育之现状》
 441 谢 冕 在汤阴谒岳飞庙（外一篇）
 446 吴克敬 阅碑小识
 453 王学泰 说“士节”
 464 叶延滨 书内书外的札记
 471 顾 骧 如此照相——往事忆拾之三
 475 冀 沅 走近爱因斯坦——读《爱因斯坦语录》
 480 傅国涌 七十年前的“梦想”——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
 490 雁 翼 《梦与醒》序
 492 洁 泯 随笔三则
 497 周良沛 人才·奴才·奸才
 503 毛志成 千载谁识一个“民”字
 507 孙 郁 托洛茨基的余影
 514 张 鸣 “调人”的隔膜与历史的迷雾
 522 叶延滨 人生杂说
 530 黄东成 “人民作主”与“为

民作主”
 533 李 辉 鲁迅，为巴金挡住风沙
 542 杜渐坤 读《我和艾青的故事》
 548 丁 帆 思想和创造可以替代吗？——兼读林德宏的《人与机器》
 556 岑 桑 说真话的纪德

2004 年

（总第 150—155 期）

562 邵燕祥 重过莫斯科
 586 林 非 关于“性灵散文”的话题
 593 舒 展 外逃贪官的末日真的到来了吗
 596 王晓华 民主是一种绝对价值
 605 钱理群 刘奇弟：胡风冤案中一个不应忘记的名字——“1957 年学”研究笔记之一
 623 述 弢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
 631 袁 鹰 又到甲申
 639 张梦阳 往事非烟百感生
 646 牧 惠 不应缺席

653	周同宾	驴上日记	680	杨资元	怀念牧惠
660	阮文涛	凤凰涅槃的楚痛 ——读《一纸苍凉—— 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有感	682	丹 晨	巴金和胡乔木
668	章 明	一个不恰当的类比 ——关于“隆中对”与 “窑洞对”	688	从维熙	博物馆的话题
672	杨 典	妖精无罪	691	穆 涛	生活记事
			696	邵燕祥	愧对马克思
			703	吴 江	学术随笔两则
			707	林贤治	包围凯尔泰斯
			712	黄宗江	随想巴金

北大忆旧（两篇）

黄修己

小小助听器

我从小就耳聋，到了上大学，已觉听课很吃力，必须坐到前排。那时我很想有个助听器，可 50 年代市面上还没见到这玩艺儿，就是有，一个穷学生怎买得起？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郭沫若先生能送我一个。和我一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的研究生李某，有一次随系主任杨晦教授，出席一个什么会，见到郭沫若。杨主任指着李同学向郭老介绍：“他跟你一样，也是耳朵聋。”郭老说：“噢，既是杨晦的学生，那我就送你一个助听器。”此事传了开来，并且说郭老有许多助听器，外国人送的。我真希望杨主任也带我去见郭老，只要说一句：“我还有一个聋子学生哩！”说不定郭老会说：“那我就再送一个！”可惜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只好暗地里埋怨自己命不好。

到了 1964 年秋，我已毕业留任助教，跟着北大部分师生去湖北江陵参加农村“社教”，即所谓的“四清运动”。如果说在校园里耳朵聋点还没什么，这回到了阶级斗争第一线，可就误大事了。我和地方干部编在一起，第一步工作是“访贫问苦”。从农民家里出来，只见地方干部竖起耳朵，紧贴门缝，屏息静气听屋里动静。我问：“你听什么呀？”答道：“在我们背后讲的才是真话。”原来他是靠偷听来了

解情况，可惜我的耳朵已丧失这种功能。那阵子我就最怕“汇报工作”，别人都能讲出某队长贪污了多少，某会计多吃多占了多少，“战绩”辉煌，我这聋子什么情况也了解不到，心里只怕被认为“右倾”，这才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买个助听器。

那时我已有著作出版，拿到了点稿费，钱算是有了。正好 1965 年春节将临，为了不扰民，工作队撤出村子。又蒙省委书记王任重特别关照，准我们北大师生的假，我得以跟着一起搞“社教”的太回广州过年。我在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助听器的店，只有丹麦和日本制造的，最便宜也要 360 元，正是我半年的工资。我在广州看到很漂亮的整套卧室家具，卖 182 元，一般人还买不起，怎舍得用 300 多去买助听器？然而为了革命，钱算什么，豁出去了。

于是急忙写信请留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替我取出锁在箱子里的存折，支 400 元寄给我。哪知北大也开始搞“社教”了，据说已揭发出大量惊心动魄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形势特紧张。我的好友因出身较贫寒，做了工作队在系里培养的第一个“根子”。400 元在当时是“巨款”，他不敢汇给我，便请示工作队，消息便传了出去。一位老师出于特别敏锐的阶级斗争警觉性，断定我要“携款出逃”。于是系里盛传“黄某人到广州，要逃到香港去啦”。我是为革命而舍钱，没想到反被疑为“叛逃”！

但不知为什么，可能是沾了“根子”的光，钱还是汇来了，只可惜迟了些，店里没货了，只好花同样价钱，买了样品。当我回到乡下，在开会时戴上这洋玩艺儿，许多农民层层围着我看热闹，年青们的好奇心重，还非要摘下来给他们听听不可。地方干部毕竟有见识，知道这是贵重物品，频频提醒：“别失手！别失手！”一些农民乐了：“这回干部该老实交代了，北大老师有机器了！”但此时，揭发检举高潮已过，它已赶不上用场，加以又怕潮，又怕震，我担水挑粪还要把它装进盒子，提在手上，实为不便，索性扔到一边去了。

后来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人们讲话嗓门都特别大，可以不用助听器了。这时我也年过“而立”，家里添了一男一女，存款

早已告罄，日子相当窘迫。太太便把我的助听器拿到广州卖给收购店，虽然只用过几次，因为是样品，只讨回个半价。

我戴定了助听器，是到了五十出头，听力更差了，又来到广州工作，为了认识新环境，便须克服听力障碍。然而听得越多，烦恼也越多，不知为何生活中就有那么多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声音。本来习惯于闭门造车，在家本可不戴，又怕听不见门铃，怠慢了来访者。戴着吧，虽在校园，亦杂声频传，除了机动车声、装修的轰鸣，还有那“收买烂嘢”的男女声轮唱，被某博士称为“校园主旋律”的呼喊，此起彼伏，扰乱思绪。所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便是早日摘掉助听器，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我一个安安静静日子。

在“文革”中讲李金发

参加在广东梅州举行的李金发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勾起了我对一段不太遥远的历史的回忆。那就是在“文革”中我向学生讲授李金发的诗。当各种现代主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颓废的流派，尤其在“文革”那种“砸烂一切”、“全面专政”的年代，要在课堂上公开地讲授中国象征派的始祖李金发，简直难以想像，或者以为是胡吹，然而这是我的亲历。

我读过季羨林、周一良两位老师回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书^①，那是受迫害的教师对“文革”的血泪控诉，但不能说那就是北大“文革”的全部。若要全面反映北大“文革”，应该各种人，造反派、保皇派、走资派、工作组、宣传队、红卫兵、整人的、被整的、铁杆的、“老鸡”的^②，还有逍遥派等等，都来回忆，才能从不同角度，全息地因而比较完整地显现北大“文革”的面貌。现在，我就来

① 指季羨林的《牛棚札记》和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

② “老鸡”即机会主义。派性斗争中一些铁杆分子把本派中温和的、动摇的称为“老鸡”。

讲讲我在“文革”中怎样讲李金发，讲讲我这一个小小的角落。

那当然是工农兵学生入学以后的事。北大第一批工农兵学生于1971年就从江西农场回到北京，正适林彪“爆炸”，批林开始。许多人借着批林来批极左，发泄对“文革”的不满。周培源传达周恩来总理加强基础理论建设的指示，得到大家的拥护，工农兵学生也要上点课了。这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剩了一个鲁迅，其他全成了“黑线人物”，作品大多是“毒草”，根本不可能开课。要讲现代文学，便只能讲“文艺斗争”，于是教学小组便决定开一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并且作了分工：我讲“五四”和20年代，孙庆升讲30年代，林志浩讲40年代。这时离开课大约还有半年，我以备课为名，躲避系里的许多政治活动，整日里在旧期刊阅览室看书。我后来在一本书的“序”中说过那时的“三个馆员陪我一个读者”的生活。早在1967年北大发生武斗后，我就当了逍遥派。因为我没有资格当“革命先锋”，也不够资格做“牛鬼蛇神”，对“文革”又“很不理解”，基本上与运动处于游离状态，大量空余正好用来读书，还有闲玩像章玩照片。那时像《新青年》、《小说月报》还有创造社几种主要刊物，都是从头到尾一本一本地看下来。这就发现与“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也与“文革”前的“革命文学史”，很不一样的史实，就像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看到新文学史上许多不同色彩、风格、倾向、流派的作品。我为有这五彩缤纷的研究对象而倍感鼓舞，心里痒痒的，很想把这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写出来。这其中就包括李金发的象征派诗。

我接受李金发的诗，准备并不充分。李诗是早读过了。受苏雪林评论的影响，苏对李诗似乎评价不高，我也就没给予太大的注意。对外国的诗又知之不多，如与李诗关系甚大的波特莱尔的诗，读后并无多大兴趣。熟悉的还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俄罗斯诗人。法国的，读得较多的是雨果。可以说喜欢的多是浪漫主义的诗。能去关心李诗，是受了朱自清诗论的影响后，用他解读卞之琳《距离的组织》、林徽音《别丢掉》的方法，也来练习“翻译”李的象征诗。那时我选了自认为容易“翻译”的几首，有《弃妇》、《有感》、《律》

等，连同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的诗，编了一本薄薄的作品选，交给学校印刷。立即被中文系出身的一位主管教改的干部发觉，他来到系里说：“你们选的都是什么诗？这怎么能印？”我们的教学小组长孙庆升顶了他：“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应该讲的，就是批判，也要把原作发给学生看嘛！”那人没话可说，作品选才得以付印。不久，我在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生的班上和留学生班，分别讲解、评论了李诗。那时的留学生是尼克松访华后来的第一批，有的已是“中国通”，是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我曾问他们这样解读现代派的诗你们感觉如何？他们表示首肯。

我能够去讲李金发，还有胡适、徐志摩等，与批林有关。在批林的文件中，保留了一句肯定林彪战功的话，我们立即抓住这句话，在学习会上为瞿秋白鸣冤：“林彪这么坏，都没有一笔抹杀，还肯定了以前的功绩。为什么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就当做叛徒一笔抹杀呢！”推而广之，历史上即便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作家，艺术上有成就，有过历史贡献，也应该有分析地讲，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样，在“文艺思想斗争史”的幌子的遮掩下，我讲了胡适等一些“反动作家”。当时固然也要有所批判，但能让他们上了“文革”时代的大学讲堂，还讲了一点他们的历史作用，回想起来，也不容易了。这是在魔鬼巴掌的捂盖下，从那指缝里漏出的一点微光啊！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约在1974年，“四人帮”搞了一回“反右倾回潮”斗争，这是不久后反右倾批邓的前奏。北大又大搞揭发批判。这回我在劫难逃，因为“右倾言论”多而遭揭发，连带着在课堂上讲李金发、徐志摩也成了罪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只讲了一遍就停了。略感欣慰的是，听过课的工农兵学生，没有任何人出来揭发批判我的课。他们当时都“左”得可怕，但仍然爱听老师讲真话，希望知道历史的真相。“文革”期间的这些经历，使我准备了一点条件，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出版了间隔将近30年后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现代文学史著；并且在这部著作中给了李金发比较多的篇幅和即便在今日看来也还算得上客观的评价。

在“文革”中讲李金发，是需要一点胆量的。为了避祸，完全可以不讲他，完全可以照着课程的题目，很方便地叙述怎么批封、资、修。为什么那时会有那么一股劲，甘于冒险呢？依我的切身体会，这要扯到北大的传统了，但这要留待以后再来细说了。

选自 2001 年 1 期

谈茶说泉

顾 骧

中国的茶艺是茶和水的最佳艺术搭配。茶离不开水，水离不开茶。“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与论茶也。”（许次纾：《茶疏》）无论是唐宋以饼茶为主的碾煎法，还是明清的散条形茶瀹泡法，莫不如此。对于宜茶之水，陆羽在《茶经》中已有论证。陆羽认为，烹茶之水，以山泉为上，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一锤定音。《茶经》以后，有了第一部专门品水的著作，这就是唐人张又新的《煮茶水记》。他在这部书里，开了对天下泉水排座次、品等级的先河，引出了一桩“品水公案”，官司打了上千年。据张又新说，陆羽将天下泉水分为二十等，庐山谷帘泉位列第一；而张又新又抬出一个名刘伯刍的人，将天下水列为七等，扬子江南零水，也就是中泠泉独居榜首。两者大相径庭，孰是孰非？陆羽已作古，死无对证；刘伯刍名不见经传，张又新又未作交代。张又新没有做到胡适之主张的“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令人产生疑窦也就难免。欧阳修就干脆认为，这是张又新假托陆羽、刘伯刍之言，自己胡诌的（欧阳修《大明水记》）。

这个“天下第一泉”我们暂且按下不表。有意思的是被称作“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下的惠山泉，千年来却稳坐第二把交椅，名噪天下，声誉超过任何一眼被称作“天下第一泉”的。这个惠山泉世事洞明，绝顶聪敏，大概它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不为天下先”，甘当“二把手”。惠山泉为历代文人、鉴赏家所推崇。尤其是唐朝宰相李德裕仿唐玄宗为杨贵妃驿递荔枝的故事，专门设置了

从无锡到长安的数千里“递铺”，用快马一程程为其传递坛封的惠山泉的记述（唐·无名氏著《玉泉子》），把惠山泉声价抬得更高，名气越炒越响，红遍大江南北。到了本世纪，无锡出了一位盲人音乐家，瞎子阿炳，一曲《二泉映月》已成为世界名曲，本世纪音乐经典。“天下第二泉”插起音乐的翅膀，飞向了东瀛西域，声名远播世界。半个世纪前，渡江战役后，我们文工团进城之初，驻扎无锡惠山寺，二泉边。可是那时绝无品茗赏泉的雅兴，辜负了那一泓泉水。

谁是“天下第一泉”？聚讼不休。中国人的人性弱点，骨子里不是自大，便是自卑。关起门来称大王，老子天下第一。最早被命名为“天下第一泉”的是位于镇江金山寺以西扬子江心的南零水，也称中泠泉。此泉在唐宋名声也很大，所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是最理想的饮品了。如今因江滩扩大，中泠泉已与陆地相连，仅是一个景观，颇受冷落。庐山的谷帘泉，虽为“茶圣”陆羽亲定“天下第一泉”，但并未因为权威的意见而大红起来。至于徐霞客认定的“天下第一泉”云南安宁碧玉泉，更是鲜为人知。你徐霞客不就是一位地理学家、旅行家么，没有显著的官阶，也不是什么权威评委主任，滇边又地处偏僻，你说它是“四海第一汤”，又有多少人认同？北京玉泉山的泉水为“天下第一泉”，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封的（《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玉泉水，有清一代，是供大内皇家饮用的；玉泉水浇灌的稻子称“京西稻”，是贡米。提到玉泉山，园艺学讲“借景”手法，都要举颐和园借玉泉山入景为例。但是这玉泉山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披着一袭朦胧神秘的面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望而不可即。我居京华也快半个世纪了，一直不识此山真面目，更谈不上有喝一口玉泉水的福分。1965年我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社教工作队。那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下达后，中央决定进行的十个城市社教试点单位之一（其他是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北京电影制片厂、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运动深入后，决定办一个“黑”画展（展品不限于美院师生作品）。当时中央分管美院社教的是康生。记得工作队吴寄寒同志向我们传达康生对画展的指示，提到北京国画院陈半丁的一幅山水画。画面一山，据说状似玉泉山。山顶一

塔，据说状似玉泉山塔。问题出在题画诗上，陈半丁题曰：“天下名山僧占多。”康生恶狠狠地判定，这是“射向党的三支毒箭之一”（还有哪两支“毒箭”，不记得了）。他还连带说起另一件事：两年前，浙江美院潘天寿来京开画展，康生为画展题辞：“画坛师首，艺苑班头。”康生说，他这个题辞是为了压陈半丁的。这是我亲耳所听的传达。康生在这里既打了陈半丁，也为他自己捧权威开脱，一箭双雕。但不知一年以后，潘天寿也成了“反动权威”、“黑画家”，康生又作何辩解的？如今世道清明，喝不上玉泉水，发一点牢骚，无关大碍；要是倒退三十年，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选自 2001 年 1 期

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

何 方

一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一直为党中央和研究界所重视。事过不久的延安整风就曾对此进行过长时间的检查和清算，留下了大量文献和档案。此后的回忆材料和研究论著更是多不胜数。但是有关这次会议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矛盾说法也实在不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八十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1984年9月提出“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①。这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李卓然等都还健在（只有刘伯承已丧失思维），听过会后传达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还有堆积如山的档案和各种资料。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非如此，有点令人失

^①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里的引证，以及此后简称的《文献》均指此书。